

一九零五

第 一 章

第一次革命時期的經濟狀況

(一九〇〇——一九一〇)

要了解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的革命，就必須詳細的去研究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的經濟環境。

俄國半封建的制度一直存留到二十世紀，其原因並不單在地主與他們的政府的有意識的力量。假使這種

力量，能夠得到成功，那是由於重新世界市場的低廉的麵包的價格。最容易表示出這一點的，就是土地價格的變更。自六十年代起，在黑土的各省如像阿爾洛夫斯基，都利斯基，加察斯基，達姆波夫斯基，佩謝斯基，弗羅聶斯基與楷爾斯基等，土地的價格不斷的增高。在八十年代，一俄畝值¹⁰⁵盧布，在八十三年時就增加到¹⁴⁵盧布了。但是在1889年阿爾洛夫斯基省，一俄畝祇值¹¹⁶盧布了。在弗羅聶斯基與佩謝斯基等省，也是同樣的情形。在弗羅聶斯基省，土地價格從1860年每俄畝⁵⁴盧布，1883年每俄畝¹³³盧布，至1889年跌落到每俄畝¹²⁴盧布。在佩謝斯基省，1860年每俄畝³⁶盧布，1883年¹⁰⁰盧布，至1889年跌落到⁸⁰盧布。

在這時期的土地的最大的買主是誰呢？自然是農民了。這從地主中農民數量在1878年為^{5.46}%，在1900年為^{19.5}%的增加，就完全表明出來了。土地價格跌落不過指示出購買土地的大主顧——農民——因為低廉的麵包的價格的壓迫，不能不停止他們的購買。所以1890年時，俄國的鄉村，進了一個停頓時代，正像在尼古拉一世時一樣。它所表現的現象，也正像1840年時代所表現的

一樣。但是1840年起，世界市場上麵包的價格，又開始高漲。如若1893——97年間麵包的價格為100，那末1898——1904年間為122，1905——12年增加到165了。

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內，麵包的價格增加到了很高的程度，超過了1825年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二月十九日以前的價格。世界市場的條件，又恢復了從前的情形，而且比從前更加穩定了。1861年前，麵包的價格不及現在到達的百分之六十五。那時最高的程度，也不過等於現在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這是因為在十九世紀之末，北美合衆國比十九世紀中葉更其劇烈的增加了麵包的輸出，差不多歐洲麵包需要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都由美國來供給。但是在1908——1912年間，美國祇能供給百分之十八了。這當然並不是由於美國農業的衰落，而是由於在美國產生了各種在七十年代從未有過的現象，如像大工業的長足的發展，與需要購買麵包的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這種變遷決定了世界市場的條件，並且更充分的解釋了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中俄國鄉村內所發生的情形。這是很明白的，麵包價格的提高，俄國麵包的出產量也增加，而且耕種麥子的土地也擴

大了。如若我們假定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四年內耕種麥子的土地爲100，那末在1909——13年間的五年內，該項土地就增加到了110。此外更在大麥與小麥出產量的比例上，我們可以看出同樣的情形（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吃的是大麥，小麥是預備出賣的）。在我們所說的最初四年內，大麥佔全部耕種土地的31%，1909——13年的五年內就減低至28%，而小麥的耕種地却從百分之18.6%，增加到21.4%。

換一句話說，麵包的生產量不但它本身絕對的增加，而且變成更具商品化了，這就是說更多量的麵包的生產是爲了出賣的。在最後的五年內，麵包的生產量從5,500,000,000蒲特增加到6,200,000,000蒲特。從1877年到1898年的二十五年內，麵包的生產量不過增加了15%，現在只有八年功夫，就增加了23%。你們想想世界市場的條件的變遷，給與俄國鄉村經濟的推動力是如何的大！

依據統計——當然是不十分正確的統計——耕種麥子的土地的92.1%是屬於農民的，祇有7.9%是屬於大地主的。

這樣說來，麵包的生產大部是屬於農民經濟方面的。在市場上出賣的1,100,000,000蒲特的麵包的商品，其中屬於農民的有78.4%。可是你們從這裏可以看出農民耕種的土地的數量與麵包出產量的相差。他們耕種麵包的土地是佔了全部的92.1%，而出賣的麵包却祇佔了78.4%。這兩個數目字，不是不相符合嗎？

這種相差是由於農民土地的收成額比較低下的緣故。如若我們把1861——71年的收成額為100，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統計：——

年代	農民土地的收成額	大地主的收成額
70	107	112
80	117	127
90	134	142
900	148	164

你們看，農民用了種種的力量跟在地主的後面。農民的經濟，雖然也是進步的，可是它比了地主的經濟總是落後的。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個理由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地主的土地所用的耕種方法比較的進步。但是我們知道，全俄羅斯地主所有的 70,000,000 俄畝的土

地，其中用比較進步的耕種方法的，祇有 3,000,000 俄畝。這樣少的百分數，對於農民與地主麵包生產量的差別，不能有怎樣大的影響。

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因為地主能更好的耕種他們的土地（這不過是偶然的事，而且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土地的肥沃，而是因為他們的土地接近於大都市的便利）；而是因為大地主在“解放”之下，從農民那裏拿去了最好的土地，所以結果農民總是落在地主的後面。而國內國外麵包市場的供給大都支持在農民的肩上，最大的利益自然給地主拿去了。

農民用盡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力量，把在1861年時認為不便利於耕種的土地與草坪都開墾了，可是他們總是追不上地主，他們看見地主田裏，蓋滿茂盛的麥子，心上真是十分的焦急。他們固然可以購買地主的土地，可是地主們當麵包可以賣到好價時，即抬高土地的價格，致農民無力購買。如若我們把1900年土地的價格作為 100，那末在哈利哥夫斯基省的土地在1898年為85，在1902年為132。在苦爾斯基省的土地，在1898年為122，在1902年為207。

其實地主從自己的土地能夠得到好的收入，肯把土地賣給農民嗎？他想更好是耕種自己的土地，個別的去剝削農民。這裏就表示出農民對地主的關係的真實影響了。農民和地主間有了衝突，這種衝突就是生產領域中的衝突，無論如何是不能消滅的。地主妨害了農民為市場生產麵包，農民的經濟是不能夠發展了，因為地主阻礙着他。這兩種經濟，勢不兩立，要別一個生存，這一個就要死亡。

我們看，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農民和地主間衝突的性質是怎樣的變化：從前是貴族和農民間的等級衝突。後來經濟方面把這種法律方面的等級消滅了。現在經濟方面出現的是有特許權的大生產者和沒有特許權的小生產者間的爭鬥了。這種法律方面的特許權就是封建時代所完全爭論的。實際上，農民不僅反對封建制度的遺孽，而且反對新發生的農業資本主義。可是農民這樣的起來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為了鄉村經濟的社會主義，而是為了他自己私有資產的小經濟。由此可知：農民本身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同盟者，這是為客觀（不管他願意與否）所證明了。

這當然是反映了農民運動的階級性。但是關於這個問題，下面再說。現在要說市場條件變更的別個結果。

市場條件的變更，不僅僅是反映在農村的命運上。俄國本國資本的積累，主要的是麵包的輸出：在麵包價格低落的時期，積累是非常之慢的，這是必然的。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間，假使沒有外國資本的流入，則經濟就要完全停頓了。在1893——96年的四年間，每年全俄輸出的平均價值是6,614,000,000盧布，而這四年的積累是104,000,000盧布。在1905——08年的四年間，雖然這個時候發生了革命和恐慌，每年平均輸出的數目是1,055,000,000盧布。這裏麵包價格的高漲有怎樣的作用：假使我們把麵包輸出的蒲特增加方面和金盧布價格高漲方面比較一下，就可知道了。1900年俄國輸出的麵包是4,188,000,000蒲特，1910年是8,471,000,000蒲特。若使我們假定1900年的輸出是100，則1910年就是196。1900年所有輸出的麵包是值3,047,000,000盧布，而1910年是7,353,000,000盧布；若使我們假定第一個數目是100，則第二個數目就是245。這就是麵包的輸出少

了兩倍，而從輸出所得到的收入要大兩倍半。

積累顯然是很快的，這是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很奇特的現象，這個可以叫做“俄國的國有資本主義”。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工業大都由外國資本生存的；本國資本只佔所有工業的百分之二十一，其餘的都是外國資本。但是到了1901——1904年，俄國工業中的外國資本只有182,000,000盧布了，而俄國資本只有209,000,000。在這最初十年代的末後，外國資本在俄國工業中的作用幾乎完全失去了；1910年所有外國公司（有十七個公司）的資本只有337,000,000盧布，那個時候俄國的資本由181,000,000盧布增到1,904,000,000，增加了六倍。這種不是用國家借款的和外國資本的俄國工業，就可叫做“祖國的工業”。

若在鄉村中麵包價格增漲的政治影響，為農民和地主間衝突的增劇，則尚有同樣明顯的其他政治影響，即資產階級對於政府態度的改變。從昂格斯時代起，愈到歐洲東部，資產階級愈落後，已成很顯著的事實。俄國資產階級的落後，俄國黨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指出了。這種進步的落後，到底是那些神奇的原因呢？豈是俄國資產階

級的血統中有這種性質嗎？不是的，這全是經濟的原因。俄國資本的積累，是靠外國的借貸。就是那些名義上算是俄國的本國企業，也有一部分資本，是由政府向外國借貸，而津貼與各企業的，但這種外國資本，是借給政府，而不是借給私人企業的；你要反叛政府，你就沒有津貼，——這就須俄國資本家自己已經有了積累。在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外國資本輸入俄國，實是大大減少竟至停頓，於是外人開始出售俄國債券，而獲巨利。在這幾年內，俄國資產階級與政府間起了很大的爭執；而在從前俄國資產階級從未敢與沙皇爭執，如這幾年的樣子。假如我們將與從西方流入俄國的黃金河的枯涸同時發生的一個重要事實忽略了，則我們將無從明白以上的情形。這個重要事實，就是黃金已從俄國本土內源源採出。從1,800,000,000金盧布(1897)增至4,500,000,000金盧布(1912)，因之資產階級的重要，也成正比例的增加。企業家已得更自由，更強大了。好在麵包價格的漲高，農產物得與工業品的價格，維持平衡，若是穀價仍和十九世紀末一樣，則工業的生產力，將遠出農業之上。

假使俄國的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比在十九世紀

中葉要更發達呢，那麼在二十世紀初比十九世紀末更要發達兩倍半了。但羅馬諾夫皇朝盡力地保持着1861年時政府所施用的政策；單就這個事實，雖不精細，已足解釋1905年的革命。俄國工業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他發展的性質正像美國，而比歐洲各國為速，且拿僱用不到一百零二人的最小企業來看，在二十世紀初，俄國只有10%的工人在這些企業中做工，而在德國則有22%。若拿僱用五百至一千二百人的大企業來看，在俄國為10%的工人，而在德國為6%。最後看那僱用一千以上工人的大工廠，在德國為8%的工人，而在俄國則足有24%。俄國在二十世紀初，生產集中，比德國還高。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結構，在歐洲算是最進步的形式。而當時俄國的政治結構，只適用於商業資本主義，而不適用於工業資本主義；却將新興工業，硬要放在這舊的政治形式之內。

但是俄國工業資本主義比較的完善，就產生了俄國資產階級從自由主義轉變到革命主義的障礙。工業的大發展，促企業家剝削工人的利益更加厲害，階級的矛盾亦更加銳利。

要說明這種現象，最好拿俄國驟然的工業生產中的工人狀況與漸進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的工人狀況相比較一下。

假設英國工人在1880年獲得的工資為100，則1900年就增到178，就是增高了半倍多。假如1880年英國的價格為100，但在1900年時為97。這樣貨幣工資增漲而生活品的價格降低，就是說英國工人真實工資或生活狀況在這十五年後改良了。英國資本家是增加了工人的工資了。他從那裏得來的呢？難道由於他的仁愛，從他自己的荷包裏填出的嗎？近似如此，實則不然。英國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當然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的。企業家利用勞動生產力之改良，只拿了生產品價格的少部分給與工人，而大部分却留給自己。1819——21年間，英國每磅棉花的製造工資是十五個半辨士，1880——1882年祇要兩辨士又三，幾乎要減少了七倍。在第一期內工人每年製出322金鎊貨物，第二時期是4,039金鎊，因此工資自然增加了。這種情形是怎樣達到的呢？自然是生產工具的改良與機器的發明：那個時期，英國機器在世界上是最先出現了。而英國工廠的生產品在世界上也最先實

現了。英國在十九世紀壟斷全世界的市場，販賣於各地，而定價方法，一方使其他資本主義不能抵抗，他方面給與工人的甚微。祇有在與德國競爭的影響之下，才變更了政策，他開始失了世界商場的霸權，英國勞動者和他的廠主的關係，很快的就破壞了。這種情形我們在他的地位中可以看出。

但是，你們說：這樣主人給與工人的，雖不是從自己腰包裏填出而取之於他人的，而也不是爲怎樣貪慾吧？爲完全明白起見，可以這樣說：事實強迫英國企業家走到似仁愛的而不是真正仁愛罷了。

事實是如此：當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人口增加非常之快，（1821——1841年的二十年間，由一千二百萬增到一千六百萬，增了三分之一）同時北美合衆國和英國殖民地（加拿大，澳洲）的經濟也照例地發展，增加了勞動者的需要，英國的“剩餘人口”就向那裏移殖。1853——1906年從英國本國移民的數目有5,500,000人以上，在二十世紀初，英國這種移民還未減少，如1903年移殖爲178,000人，1806年爲220,000人。

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勞動者是很多的，所以工廠

廠主可以不客氣的對待他們，但愈後來，就愈想設法使工人不離開去，如此祇有“引誘”工人了。這就是英國資本家的“自由”和“仁愛”的經濟層；英國的工人沒有認識自己的企業家壓迫的工具，這種工具是歐洲大陸工人中所沒有受到的。

俄國這樣情形是完全沒有的，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企業家是想不到爲他做工的工人的數量是否永遠足夠的問題。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就是“勞動後備軍”的形成，是愈趨愈快了，這些例子，我們已經見過了，現還有別個例子。在1888——1892年中，中部黑土帶的九省農村所有的馬匹減少25%（自4,000,000匹減到931,000匹），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每千人耕種土地爲825俄畝，至1900年只有547畝了。農民向西北利亞的移殖，因爲與地主利益有損，遂受官廳的阻止；蓋地主不願喪失廉價的勞力和豐厚的租銀。於是“自由”的向西北利亞遷徙，在1890年有五分之四是如此去的。但是這種“自由”的遷徙於西北利亞的過程中，孩童竟無一個活着，大半的成年人都死亡於途次，這種恐怖情況，是窮困與失望驅策他們去嘗試的。惟有小康的農民，有積蓄的和有糧草的，非無產階

級，才多少得着比較的安全。農村的無產階級甯願競爭去做僱傭，能夠進到工廠裏作工算是幸運。衰落的農村，凡遇到附近開設工廠了，往往能恢復原狀。所以移殖西比利亞者，幾乎沒有一個從工業省區來的，這是無足怪的。

據當時二十一省的統計，至少有5,000,000過剩工人的數目，在農業上找不着什麼工作。在工業區域的工人總數，約為2,500,000人；所以“產業後備軍”的人數比常備軍的人數要多百分之百。在這種情形之下，工廠主往往自己認為，就是農村中求得工作做的工人也認為“恩主”，如果多少給他們一點錢。這種情形我們在莫斯科或在莫斯科省可以看見的。所以俄國的工廠主用不着去怎樣“餌誘”工人，祇要給他們一些工資就好了，這也不足怪的，假使我們拿1892年俄國工廠工人的工資當作100，則一九〇二年的工資增為105。同時我們再拿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麵包價格為100，則一九〇二年的價格為125。所以實際上俄國工人的真實工資減低了。英國工人的生活遮蔽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剝削面目，而俄國工人的生活，在每分鐘的時候都使他想到資產階級殘酷的剝

削。 所以俄國工人只要一覺悟了，瞭解了本階級的利益，就成爲一個革命者；俄國的“覺悟工人”和“革命者”是一而二，二而一，是毫不足怪的。